

乡土中国、性别立场与伦理观

——对中国女性乡土写作的思考

郑斯扬

内容提要 女性乡土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女性乡土写作将女性的发展与乡土中国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性别和历史的关系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性别、主体性与乡土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主题，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性、现实性的多元女性形象，揭示出中国女性传统和女性观念的内在统一性，以及随时代发展的女性精神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女性乡土写作在性别伦理阐释和再现乡土文化方面的创见，为中国性别理论建设提供了可依赖的资源 and 经验，成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展开对话的立足点和出发地。被重塑的性别立场与乡土历史的碰撞，产生了话语结构、审美体验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而这必然成为我们民族自我书写的组成部分，也将汇聚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新内容。

关键词 女性乡土写作；乡土中国；性别立场；伦理观

乡土文学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重要成就，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人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女作家史无前例地创作出足够数量与分量的乡土之作^[1]；在女性性别书写意识相对自觉的作家的介入下，乡土文学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介质，呈现出什么样的有别于此前的关注点、反映面与伦理观，将带来什么样的文学、美学与社会效应，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命题。但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女性乡土写作的成功之处已经显示出其传统的要旨和信心。它一再地提醒我们应该向历史的纵深处走去，关注其中的主题、话语、处理方式、艺术手法——可以赋予中国女性写作的那些理论资源和思想力量。

把“女性乡土写作”作为一个研究问题来关注，也为我们集合两种历史研究线索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虽然女性乡土文学总体的数量不多，但它作为一种写作形式的出现是连续性的，这实际上应该归结于社会思潮的许多进展。特别是女性发展与民族国家、社会变迁和新生活形成的联系，

使这种表现女性与乡土历史进程的书写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发声”。另一方面，一直以来，萧红、丁玲、铁凝、迟子建等人的乡土写作总是被作为个案研究划入女性文学范畴，研究者很少能从乡土文学的主题层面考察女性写作的理论和文学活动的重要意义。而大量援引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则忽略了性别视角和本土各因素密切结合的重要性，使人们疏于考察“女性乡土写作”里“中国女性”富有的本土性、现实性的多元形象和多重内涵，未能确认女性乡土写作的发展都是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中、从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中显现出它的意义，以及乡土写作这种文学形式的出现实际上本就是女性文学发展内部原理所决定的^[2]。因而，要研究中国女性乡土写作，把乡土视角和性别视角结合起来的考察方式是必要的，它把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与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更加充分地联系起来，为理解乡土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历史提供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张力。张力是创造性的，它指向分化的特殊性，也说明存在的普遍性，而这才是文学活力和活性的真正表现。

一 性别视角的转变与走进乡土世界

在乡土小说研究的源头上，性别意识与乡土写作之间的关系，性别伦理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史角度上都表现出一贯的男性视阈。1992年，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在分析静态传统文化与动态现代文化之冲突问题时，特别指出女权意识在城乡小说中的先锋意义。他以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和铁凝的《玫瑰门》为例，指出女性性态之于小说的新意，实则构成了对以单一男性文化视阈为中心的乡土小说的有力批判^[3]。当时丁帆的分析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过多注意，还未使人们意识到女性乡土写作的双重特性——它作为打开乡土经验的一种文学方式，向一直以来的乡土文学抛出理论悬念：是否只存在以男性文化视阈为中心的乡土写作空间？同时作为一种写作方向、一种理论追求、一种文化价值观，王安忆和铁凝在创作上的变化暗示了中国女性文学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鉴转向对于自身历史的探索。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作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被引入中国，构成了一个重要事件——它使更多、更深刻、更神秘的疑议出现在我们未曾预料的批评视野之中。20世纪90年代，林白、陈染、徐坤、徐小斌、海男、翟永明、伊蕾、棉棉、卫慧等人的创作以个人、自我、身体作为表达的重要主题，对传统男性文化形成震荡和挑战。一时间她们声名大噪，也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理论批评。比较集中的批评观点认为，“个人写作”或“私语写作”从反传统的思想滑向性别对峙的激进主义，是一个以物质冒充精神的复仇者。众目睽睽之下的禁忌语，既没有伤及男权文化分毫，也未能引导读者深入艺术本身^[4]。然而，应该看到“个人写作”本身旨在争取一种女性书写和表达的权利，因为传统的性别伦理不可能拯救或奴役具体的每一个人，所以个人通过体验与书写建立关联就是试图设法使权威和权利让渡。“个人写作”提出了一种策略性的反抗模式，即通过女性个人的体验把人们引领至历史之外，使人们认识到我们从来不是我们自己或自己作品唯一的作者。

随着中国“三农”问题的不断加深，城乡变迁的社会问题日益导向了女性文学之中，林白率先对此做出反应。《妇女闲聊录》的艺术形式致力于对于一种不被关注的悖论的揭示，它指向了乡土文学在其传统写作方式上脆弱性的一面。这个悖论就在于，一方面女性话语（琐碎闲聊）一直被传统宏大的叙事排斥和驱逐；另一方面在琐碎与微不足道中，语言同样可以形成一种视角、一种有力的表述，甚至是一种反抗，同样可以去接近本质问题。丹齐格曾经揭示过这个悖论：碎石造就想象之墙，危险才会诞生杰作^[5]。

林白在借用个人、自我、身体作为表达的重要主题的时候，讲述的却不再是女性个人的那些故事，而是有关乡土中国的种种问题所在。事实上，21世纪以来，女性文本已经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着力描述和表现性别的差异，即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的那些东西。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把性别议题引入到乡土写作中去。王安忆的《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发廊情话》《匿名》，铁凝的《笨花》《逃跑》《谁能让我害羞》，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城乡简史》《灭籍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花籽子的春天》《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歇马山庄》《吉宽的马车》，葛水平的《喊山》《甩鞭》《地气》《狗狗狗》，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坐上吉普》，盛可以的《北妹》《野蛮生长》《怀乡书》，鲁敏的《颠倒的时光》《逝者的恩泽》《思无邪》，王华的《花城》《花村》《花河》，马金莲的《碎媳妇》《长河》《马兰花开》，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盛琼的《老弟的盛宴》……事实上，进入乡土本身既是一种立场，又是一种命运与共的担当，其实依旧是深入理解当下时代精神、社会现实、文化价值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实践。乡土中国的问题是庞大而驳杂的，为了理解其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分辨文化、伦理、道德连接而成的网络关系以及最小细节，如果依然采用个人写作中性别对峙的单一视角，即便可以据理力争，但很可能在某些时候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不可能通过一次一劳永逸的分辨来澄明历史变迁的种种明细。

这一时期女性乡土写作不论是在主题选择上还是阐释方法上,都表现出宽广的视野。铁凝的《笨花》把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从英雄叙述过渡到对笨花村的叙述。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内在细节与进步力量,尤其看到由女性展现的沉重大历史既是世俗的又是不朽的。正如每一个读到《笨花》的人所知,在中国有无数这样的笨花村,它们是开在中国民间大地上普通而平凡的花朵,却一直以最自然朴素的方式释放出永不消散的花香。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的事迹和它所遭遇到的历史苦难。这其中有与气候、猛兽、瘟疫的抗衡,有在繁衍生息中创造出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更有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的民族精神,还有在现代文明碰撞中的迷失、怀疑和伤感。迟子建以隐喻的笔法指出,现代人对于自然、历史和人类的理解是多么的傲慢、暴力与浅薄,而那历经百年沉浮的鄂温克族人却在最艰难、最脆弱和最危险中呈现出不朽的民族品格。当所有历史从一个女人的口中说出时,毫无疑问历史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即女性自身阐释了对于民族、社会和人类的认识和理解,并于其中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身份。王安忆的《匿名》从一个男人的失踪说起,提供了关于时空、自然、历史和文明再生的话题。在一个充满原始神秘气息的乡土世界里,生命和自然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人的力量、智慧、意志、理性得到了再生。于是一种新的精神将会照耀万物,也将重新为一切命名。王安忆通过对男性与历史关系的再释义,指出男性在历史之中是无名的也是匿名的,他们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任命自己的责任中完成对于历史新秩序的建设。

在处理乡土中国历史和性别立场的关系时,马金莲和李娟的书写可以被视作另外的经典范例。马金莲的六个短篇小说《1985年的干粮》《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88年的风流韵事》《1990年的亲戚》和《1992年的春乏》围绕西海固的乡村再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回民家庭的生活往事。通过乡间种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作者把家庭、家族与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将一个民族的联想和记忆内化到对乡土的热爱之中。值得注

意的是,乡村生活和性别秩序在她笔下还被视为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并被诠释为宁静美好的社会记忆。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遥远的向日葵地》和“羊道”三部曲等作品展现游牧民族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文明进程。李娟以善意的反思把对游牧文明的记录变成一项历史研究并引发人们思想观点的各种碰撞。这种以“非虚构”形式承载社会问题的思考方式在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就已显现,但李娟的创作则从更大的历史视阈,将文明的冲突向一种广阔的反思性上推进。这种文明的转向是不可逆转的,并且随时间的推移向更大的地理区域延伸并形成历史累积。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让人惊叹的是母亲无论多么艰辛仍然坚持经营葵花地的态度和行动。这是边塞女性在社会中的多方面改变,是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人新的人文风尚,也将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呈现于世。

女作家在个人写作和乡土写作之间获得了有关写作的新经验——从个体经验转向集体经验。个人性的经验是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理性的,而集体经验则是流动的、杂糅的、易变的,不断地裹挟着历史的传统翻转向前。这种转变也使我们看到女性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对于女性写作正在探索的路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切思维都是批判的思维;因此那种在重演过去思想的思想,也就是在重演它们之中批判了它们”^[6]。如果说个人写作中的女性经验是单一的,它旨在通过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传统之间形成张力关系,提供一种鼓励或者动力去对抗传统,那么,女性乡土写作则通过汇聚不同、流动变形、将传统与社会包裹起来,建立起对于女性经验的认识与理解。这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全貌,来源于对真相洞察的理性,而不是为了说服或者对抗。

二 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

女性乡土写作有自身的文学传统、价值观念和美学追求。“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诞生,随之女性的乡土写作也悄然出现。陈衡哲、白薇、冯沅君、罗淑等人立足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写出她们所受到的种种压迫与残害。其中乡村女性反传

统的斗争，不但创造了过去文本中不曾有过的乡村女性人物和女性故事，引发了文学事实和文学视角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的乡土伦理道德主张还引发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视角方面的新问题。

鲁迅、叶绍钧、柔石笔下的那些软弱的“妻子、媳妇、母亲”之角色，却在陈衡哲、白薇、罗淑的书写中引发了“出走”的内在冲动。罗淑的《生人妻》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反抗“典妻”陋习的女性形象^[7]。生人妻的逃跑成就了一个重生的假想形式，使整个社会共同介入向封建伦理秩序挑战的可能。这是一种不同于“五四”时期“少女出走”式^[8]的有关女性解放的处理和阐释，旨在延展“出走”的其他意义和形式。也许这样的表达还不能给出一个足够清晰的有关“个体/主体诞生”的价值，但“至少让我们明确，这里事关一种价值。不管如何模糊不清，已经从连接不断的觉悟达到反抗的衍变了。这种觉悟寓于对一种价值的突然感知，世人可以完全与其身份认同的那种价值”^[9]。与“少女出走”式的话语相比，一个乡村妇女的出走/逃亡，更能呈现女性终极反抗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意义——扯断了与自然、生命的连接，将命运与可预见的灾难直接联系在一起，证明了一个迈向历史的抉择：要么服从于一种罪恶，要么团结起来为反抗罪恶而战。

“出走”的艺术形式不但成就了对于乡村女性形象的多元塑造，而且提供了潜藏在女性历史深处的爆发力和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哦，香雪》率先在铁凝的文学想象中，把“出走”的表达与女性“离土”发展结合起来，呈现出女性历史发展的一种运动方向。而王安忆、孙惠芬、葛水平、北北、魏微、盛可以等人的创作把乡村女性作为时代的代表，表现了她们在“离土”岁月中寻找人生目标的各种过程和生命感受。这些创作运用了这样一种观点：乡村女性既是传统文化的反抗者，也是新文化的建设者。

女性乡土写作另外一个突出表现是把女性身体处理为挑战社会秩序或推翻传统男权思想的一种艺术手段。这一激进的文学命题不只是一要分析“性—性别”关系的历史再现问题，揭示历史对女性的忽视和怠慢，而且还要建构起一个文学空间，一个不

同于以往的、又是历史的女性之所，从而可以立足这块高地进入未来的艺术话语之中。萧红和丁玲是把女性身体问题置于民族国家以及战争的问题之上来讨论。萧红的《弃儿》《王阿嫂的死》《生死场》《呼兰河传》在女性的身体之痛中明确了女性生存的秩序和界限，把一直被遮蔽、忽视或内化的女性经验揭示出来。她把女性对于命运的反抗推进到民族意识和抗战情绪不断壮大的维度中，使我们看到了乡村女性和乡土中国的坚韧之处，而这正是一种不受命运主宰的新的女性生命形式。丁玲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则呈现出一个在民族国家意义上站立起来的女性英雄。她不但顽强地抵抗日寇侵略的罪恶，更展现出了一种绝地而生的抵抗精神。丁玲转变了有关贞洁美德的判断，并以艺术的手法赋予女性“为贞洁而战”的正义之名。丁玲不但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民族国家的保护、对于救亡与启蒙的担当，如果作为核心的美德，就应该正确认识妇女在抗日运动中的政治作用。这使对贞洁问题的审视方式以及有关美德统一性的看法得到与以往不同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这将开创一片新的精神天空，女性不但可以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权威，还真正进入了政治生活并与中国的未来建立起新的关系。

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在女性乡土写作中一直都是一个充满艺术意味的命题。它不但可以接通历史之中的苦难与暴力，而且可以揭示欲望和梦想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有效地汇聚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提供精准分析女性历史问题的可能。事实上，乡村女性“出走”传统的开端就以最直截了当而又危险紧迫的形式显现出女性生活的难处。丁玲的《阿毛姑娘》《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以闯出乡村的两个女性人物的悲剧说明女性很可能在追寻自我独立的路上滑向奴役之途。而铁凝的《青草垛》《小黄米的故事》、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孙惠芬的《歌马山庄》、葛水平的《守望》、盛可以的《北妹》、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等故事则指出，尽管乡村女性社会活动范围已经扩大，但是依然没有全面地把追求女性发展和建设主体意识联系起来，

性别意识的转变还很滞后。她们不但参与城市社会的能力很弱，而且很容易把性与金钱、身体与利益、欲望与理想、自由与放纵相互混淆，集中表现出以性为代价的社会退缩行为。盛可以的《北妹》对于女性性观念的变化表现出特殊的敏感。她提出了性自由的议题，包括对乡村女性社会处境变迁、女性意识改变和当前两性关系转变的关注，尤其强调了性自由已经被抬高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上，成为女性确认自我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并且被指认为一种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观念。《北妹》可以看作是女性摆脱男性性支配/性政治的成功之作，不过更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在赞许女性追求自由的同时，始终把女性发展与加强社会道德建设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任何单纯的个人生活风格无论表面上看多么时髦和超前，都不应该被视为道德立场而持有。正像查尔斯·泰勒所提醒的那样：“甚至在有些地方，个人自由和工具理性的扩充被视为思想，这些思想的内在魅力可以帮助解释其兴起。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这种魅力也总是在非道德的意义上被理解的。那就是，这些思想的力量不是依照其道德力量来理解的，它们之被理解仅仅是因为它们似乎给人们带来利益，不论人们的道德看法如何，甚至无论他们是否有道德看法。”^[10]“为贞洁而战”的美学意识表现为女性身体/性伦理的自由。它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在展现女性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重回女性解放的理想原点，从光明处出发也让女性的发展更加开阔与壮大。

对传统价值的反思一直表现在女性乡土写作所提出的问题里。反叛旧道德、旧传统、旧习俗，探索女性的解放之路是女性乡土写作一直以来的文学传统，但也仍然存在另外一种回溯历史和传统的视角，提供给我们热爱乡村和守护乡土的另一类故事。在《六一姊》《冬儿姑娘》《往事》《我的母亲》等充满乡愁的创作中，冰心在传统寻常事物中发现美和善，强调包含在传统之中的道德资源和精神资源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茹志鹃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小说《百合花》，通过新媳妇借给战士被子和为受伤的战士擦身体这两个行为，呈现了乡土社会的人情人性美。在迟子建、马金莲、李娟看来，故乡“北极村”“西海固”“阿勒泰”不但是文学永

远的根，还是精神世界的净土，蕴藏其中的传统价值和传统美德形成了社会文化的肌理，是最为永恒的一种精神传统，并且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指引。如果说迟子建的《女人的手》《逝川》《空色林澡屋》等小说融入了对于女性传统美德的颂赞之情，尤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追溯历史的手法建构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观念体系：女性和男性一样，从来都是历史的言说者。那么马金莲和李娟的创作则反映了女性在发现和传递民间生活经验时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她们把对乡村女性的认识引入一个新的方向：女性是历史经验的积累者和传统的继承人，更是社会文明化的开拓者。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同样提供了一种沉入历史的态度：奶奶的认知就是“我”获得成长的历史，而“我”对祖辈生活方式的理解恰好表明青年一代对于历史和传统沉入的态度。这里，女性并不是在持续展开的社会发展中延伸传统精神，她们更可能在不断的转折和变调之中呈现她与传统的新型关系。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提供了另外的表达，主人公李平是个在城里从事“三陪”行当的乡村女孩，而后返回乡村嫁做人妇。李平和潘桃都是村子里漂亮的媳妇，两人也在暗中比美较劲。由于两家男人出外打工，寂寞拉近了两个女人的距离，使她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后来潘桃因为李平的冷落，把她曾经在城里的秘密透露出去，不但断送了两人的姐妹情谊，还毁掉了李平的家庭，更无情地把李平从歇马山庄彻底逐出。实际上，这个故事中包含着“离土”女性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李平之前的越轨行为是乡村的耻辱，那么潘桃的道德立场是否证明一种有关美德和耻辱对峙的合理性正义？还是说，二人此前的友谊本身就是一种立足于当前乡土社会的女性美德呢？孙惠芬的睿智就在于她通过冲突来呈现女性正义和友谊之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样的理智美德、伦理美德才能构筑女性和乡村建设之间新的关系？重要的是，作者指出女性之间的理解和团结才是家庭、乡村和社会共同体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所在。

女性乡土写作着眼于乡村女性主体性的发展和如何理解乡村女性与乡土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这已经是共识。从陈衡哲、白薇、罗淑到铁凝、王安

忆、迟子建，再到新世纪比较突出的女性作家，如孙惠芬、葛水平、盛可以、乔叶、李娟、马金莲等人，她们的书写在伦理观的表达方面和乡村女性的塑造方面，呈现了以女性意识为核心的观察角度和命名方式，揭示了乡村女性与自然、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种种关系，引导人们了解那些被有意或无意忽略掉的女性的历史。她们的书写不是去争论以男性为主体的乡土文学的不充分，而是考察在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介入下，思考女性乡土文本如何呈现女性与乡土中国之间的重要关系——既相互说明又相互建构。

中国女性乡土写作的思想张力表现为：一方面把性别问题推向民族、国家、社会、族群以及时间、空间、伦理、道德的范畴内，呈现女性乡土写作在严峻的时代课题面前的写作力度、强度和广度，还有在历史实践中发展而来的中国女性文学的观念力量；另一方面又深入到乡土世界的内部和细节里，挖掘中国本土的女性传统和女性精神，揭示女性是如何在启蒙、革命、救亡的政治变革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里，发挥自身参与改变世界和社会的作用，以及从历史深处发展而来的有关女性意识的理论和主张。这种关注性别又不囿于性别的写法，为获得有关乡土中国的立体图像和为现实性别问题寻找历史源头提供了联系。这种关注有效地把中国乡村女性、历史传统和普遍问题结合在一起，很好地呈现了对乡土中国的发现与书写，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把视角从“弱者”女性的传统认识中转移出来，呈现有关乡土中国女性的另外一种历史：“女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含糊弱小的名字，而是历史中的强者。在这里，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乡村女性破天荒地占据了文学艺术的空间，在女性话语和女性形象的呈现中牵引出乡土中国的历史，并在其中展现中国女性传统与女性观念的统一性，以及随时代发展的女性精神的先进性。这样一来，女性乡土写作开辟了对于中国乡村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探索之路，用有关女性发展的历史对乡土中国的理解做出富有意义的分析，从而为综合此前乡土写作传统提供新的思想线索，也为建立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的理论传统提供本土的思想资源。

三 作为一种经验的中国女性乡土写作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被引介到中国以来，为我们认识中国妇女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伍尔夫、波伏娃、米利特、克里斯蒂娃、西苏等女性主义经典思想家的影响依然延续不断。然而，我们也早已看到这一系列理论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一些作家或研究者不免会表现出以理论为先导的机械，或是对于理论正确性证明的僵化。事实上，我们并不是附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生成物。我们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历史语境开疆拓土，并在与西方女性理论的交流对话中创建一种新的洞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如何克服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焦虑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性别研究者面对的首要理论难题。一大批学者，如王金玲、杜芳琴、王政、贺桂梅、董丽敏、杨莉馨、周乐诗、魏天无、魏天真、乔以钢、刘慧英、杨联芬等对于如何把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从一般性的阐释发展成为积极性的探索进行了持久的努力^[11]。

但是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在本土资源中独立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尽最大的努力去发现西方理论解释力的范围和限度，并且控制西方理论之于我们的种种影响焦虑，脱离其中明显的理论制约，避免陷入任何一种依赖和依附。那么，如何从本土资源中挖掘出可以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话的东西呢？这个答案的发现只能归于我们思考本身，归于我们对于中国女性经验连续不断的探寻和总结。

十分明显，中国女性乡土写作对于乡村女性的关注，首先表现为对乡村女性形象的展现，诸如反传统的意识和行为模式，对革命和政治的投身，对身体伦理的超越，对于自然和传统的守护。女作家对于乡村女性的塑造和表现，成为中国女性反封建文化的范例，也成为中国女作家表现自我写作意志的范例，还是反映乡土中国历史变迁的艺术范例。当中国的乡村女性形象和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女性“他者”^[12]形象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女性乡土写作在多个方面一直都是自觉地去抗衡女性被他者化的历史，在这些作家笔下，乡村女

性成为她们创作中的理想类型，那么这种“理想类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阿伦特在分析历史人物的典范作用时指出：“因为理想类型的巨大优势正在于，他不是带有寓意的人格抽象，他是从过去或现在活生生的人群中被挑选出来的，因为在那个为了显示其充分意义只需要做一些净化的现实中，他具有一种代表性的意义。”^[13]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重要的提醒：女性乡土写作在发端之初，就把乡村女性富有独立精神和决定性意义的道德行为上升到女性主张的层面。罗淑的《生人妻》赋予了一个乡村女性独自一人谋求新生的理想，构成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次博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场战斗、道德与罪恶之间的一种判断。我们必须看到，这种道德观中女性自觉精神力量的所在，也就是对女性命运和历史关系的阐释。这个思想的源头藏在女性自身的经验之中，当然它不能排除封建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于女性的压迫，但是女性依然具有建立主体和自我的能力。正因此，我们在女性乡土写作中，看到那些乡村女性对于自我不同身份的创造。她们不再是典当的物品，而是反抗者、造反者、英雄、外来妹、继承者、开拓者……她们寻求的是改写与被动、软弱相联系的女性身份和个人权利，并从自我的支撑中考虑如何赋予与自己生命相关的另一种人生理想和道德追求。女性乡土写作对于女性身份的强调包含着中国女性意识的现代性演进，从身份出发的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成为女性乡土写作历史连续性的发展。这就像是一个路标，通往女性发展的未来，以一种不断更新的女性身份呈现乡土中国发展的过程，既审视过去又指向未来。

对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提供了有关乡土中国的另一个维度。萧红关于女性身体的书写推动了女性对于生物性或本质性的探索。虽然女性的抗争是异常困难的，但是生命观、保全自我的意识很可能突然出现，形成反抗的无意识。萧红成功地提供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视角：女性身体的密语才是掀起女性造反的口令。从这个角度看，丁玲的书写则展现了女性身体的张力和战斗力：一方面所有的传统伦理把贞洁拉到了最狭隘的层面；另一方面贞洁也可以被提高到民族国家最正义的层面，作为打响抗战的

第一枪。丁玲尝试构建启蒙与救亡的同步关系，形成共同的集体意识，从而反过来稳固启蒙与救亡，这成为乡土写作中身体叙述的高光时刻。当身体表明解放的含义时，也勾勒了与以前大不同、却一样严肃紧迫的对于女性身体的召唤。在城乡变迁中，女性身体与金钱、利益、欲望、梦想、自由、乡村、城市的关系处于不明朗之中，尤其是性伦理的改变时刻提醒人们需要对女性意识进行不断的关注、梳理和分辨。这群乡村女性以集体的面貌浮现出来，她们一上来就知道自己的力量所在，不断扩大以身体闯荡社会的威力。这似乎与历史中的贞贞有一个相似的联系，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贞贞才是破晓边缘的引领者，她们则更像是自由的迷恋者，试图急速地扩大自己的社会空间却又总是脱离行动的轨迹。在这里，我们看到女性乡土写作中关于身体的多重路径：身体没有局限在性别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而是提供了与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相异的女性意识^[14]。事实上，早期萧红的女体书写就表明女性身体和乡土中国之间的隐喻关系，这种从一开始树立起来的女性意识，就已经作为女性身体与文学关系理解的思想先锋，潜移默化地进入到女性写作之中。在城乡变迁背景下的女性故事中，作家们并没有把女性与身体的关系置于道德真空中，而是把身体抛进时代与社会的漩涡，让身体的好坏与善恶出现在男女共同构成的世界里，而不是把女性的身体置于乌托邦的幻想里，赋予女性身体绝对的纯洁与合理。

董丽敏曾经指出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水岭与西方女性主义划定不同关系，并提出这种内在与外在的联系所形成的问题：今后中国的女性主义依赖的资源是什么？中国已有的女性传统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15]？中国女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开端始于“五四”时期女作家群体对于男权传统的反叛，但包含在这个传统里的还有对于女性传统和女性美德的赞誉与肯定。这让我们在确定中国性别理论思想资源的时候，突然发现曾经冰心的女性观会在女性主义传统的探寻路上，变成我们理解问题和发现洞见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正像阿伦特对传统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就我们的传统而言，这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只要这个传统的

开端还活着，它就能拯救一切，把一切带入到和谐之中。”^[16]冰心对女性传统角色一直持肯定态度，这在她早期的议论文和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她笔下的母亲、童心、自然意象在“五四”时期的创作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冰心把对母爱的诗性书写发展成为关于女性解放的命题：一方面通过母爱之名反父权制文化提供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的依据，从而推动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明确传统中富有价值的女性意识，因为真正的女性解放首先要准确预设对立面，这是建构转向的立场。母爱是一种女性身份、一种女性气质，是一种可继承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力量。冰心对于母爱的强烈书写也成为了她对一种女性思想的强调，即用自然之爱调和历史、政治、社会、家庭的矛盾。这种思想一如她在驻日期间的种种演讲中所释，即母爱是沟通人心的桥梁，也是赋予女性抵抗强权和暴力的根本力量^[17]。“换言之，冰心模式就是女性‘圣杯’式的文化特质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冰心模式似乎是在无意间显现了女性本源的伟大的特征。”^[18]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成功地把性别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对生命与爱的守护。它不是以伍尔夫、西苏的“双性同体”^[19]概念弥合两性之间的分离，而是通过女性对于自我的认同逐步创新性别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相异的，强调女性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结 语

女性乡土写作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对性别立场的确认。从强调性别差异的理论视角到广泛而具体地书写女性的乡土经验，女性乡土写作在批判性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挖掘本土性别理论资源，为乡土中国的书写重新配置新的性别立场。其次，女性乡土写作中的历史书写具有宏大的视野。早期的女性乡土写作，选取个人、自我、身体作为表达手段，为的是反抗以男性文化视阈为中心的单一的乡土写作，以此反映女性经验的独特价值和性别意涵。在扩大写作视野之后，女性乡土写作突破性别视角的二元对立，致力于展呈女性文化视阈下的历史与社会分析，如

对历史、自然、文明、民族的讨论，并由此重新思考作为一种历史分析范畴的性别理论，在乡土书写中被接受、理解、使用的状况。再其次，重塑的性别立场与乡土历史的碰撞，引领中国女性写作不断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发掘问题与展开探索，其中产生的话语结构、审美体验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必然成为我们民族自我书写的组成部分，也将汇聚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新内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研究”(项目编号17CZW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这一时期女作家史无前例地创作了大量的乡土之作，并获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迟子建的《清水洗尘》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王安忆的《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葛水平的《喊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范小青的《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邵丽的《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城外的小秋》获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盛琼的《老弟的盛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林白的《万物花开》、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铁凝的《逃跑》入选2003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获得第三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年度小说家”奖。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长河》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2] 参见王宇《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 丁帆指出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和铁凝的《玫瑰门》都以女性心理的性态为线索，重新塑造充满女性意识的形象系列。这是女权意识在城乡小说中的显现，旨在完成对于传统文学中单一男性文化视阈的爆破。参见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第302—31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 参见邓晓芒《当代女性文学的误置——〈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

[5] 参见丹齐格《什么是杰作》，揭小勇译，第235—23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第2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许杰的《赌徒吉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典妻”陋习的创作，之后出现的台静农的《蚯蚓们》、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都秉持着“五四”文化启蒙中对女性命运人文关怀的传统。

[8] 林丹娅指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体介入社会性书写的文学话语存在两种明显的话语特征：一是以“出走的少女”为表征的、基于寻找自我解放之需求而构成的倾诉式文本，具有“妹妹找哥哥泪花流”之特征；二是相对于“少女”形象的成年妇女，通常以充任“妻子、媳妇、母亲”之角色作为表征的文学创作。第二类妇女形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压迫与被侮辱的女性，这类形象展示了中国封建宗法制统治下妇女的苦难与凌辱；而另一类就是以“万能的母爱”为表征的、基于反父权制文化秩序之需求而构成的讴歌式文本。参见林丹娅《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

[9] 加缪：《反抗者》，沈志明译，第3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10] 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第27页，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11] 刘岩总结了国内学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本土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参见刘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与对策》，《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5期。

[12] 波伏娃的《第二性》从“主体”与“他者”关系出发，做出关于男女两性历史结构的经典论述——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参见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13] 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陈联营译，第1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4] 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以反抗和颠覆男权

文化秩序为目标，鼓励女性书写自己的世界。她把女性的身体经验作为女性写作的精神支撑和理论资源，女性经验被认为是绝对的语言和道德之声。关于女性身体经验的独特性和纯洁性是她的写作信念，她把女性身体经验提到至高的位置，使关于女性身体经验的理解偏向于女性生理经验。参见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第188—2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 参见董丽敏《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6]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第14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7] “二战”结束后，作为驻日代表的冰心写有多篇公开致日本人民的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讲。《给日本的女性》《给日本青年女性》《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给日本学生的一封信》《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等文章，选择以母爱情怀和女性精神接通中日两国人民相通的苦痛感受，还有对和平、自由的追求与向往，明确地表达了宽恕日本的政治态度。参见《冰心全集》第3册，卓如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18] 林丹娅：《冰心儿童观及其写作意义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

[19] “双性同体”的概念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一个核心的观念和理论术语。该理论是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率先提出的。她强调两性之间的自然融合对于女性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指明一种性别的完整状态。西苏发展了“双性同体”的概念，指明了一种不消除性别差异的开放的双性体验。这一概念构成了西苏“女性书写”“身体书写”的理论精髓。参见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第188—211页。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罗雅琳